

# 文 文 探 微

周  
勛  
初  
著



南京  
大学  
古典  
文献  
研究  
所  
专  
刊



DE50/22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

# 文 史 探 微

周勋初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4360

上海古籍出版社



1134360

封面题签 程千帆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

**文史探微**

周勋初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六合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9.625 插页3 字数213,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600

统一书号: 10186·743 定价: 3.00元

## 目 次

王充与两汉文风·····	1
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	23
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	40
《文赋》写作年代新探·····	48
魏晋南北朝人对文学形象特点的探索·····	57
梁代文论三派述要·····	88
刘勰的两个梦·····	116
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中”说述评·····	123
《秋夜有怀高三十五适兼呈空上人》诗发微·····	156
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	167
柳理《刘幽求传》钩沉·····	189
《〈唐语林〉原序目〉考辨·····	205
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226
《唐十二家诗》版本源流考·····	238
叙《全唐诗》成书经过·····	249
北宋文坛上的派系和理论之争·····	278
后记·····	302

## 王充与两汉文风

王充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近人曾予多方论述，然据我看来，大家似乎比较注意分析理论本身的几个方面，而对他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关系，即影响一代学风转移的重大方面，却还缺少注意与叙述。今特就此荦荦大者，试作论证。

### 两汉文风重摹拟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者用什么办法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官僚队伍，常能影响一代文风。例如唐代以诗取士，士子集中精力钻研诗艺，因而助长了唐诗的繁荣。这也是政治影响文学的一种表现。汉代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科举制度，但也有着组织官僚队伍的各种具体办法。除察举与徵辟外，这项任务主要是由培养经生和提拔赋家来实现的。

通经和献赋成了文人踏进仕途的两条捷径。

《汉书·儒林传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覆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于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颜师古曰：“言为经学者则受爵禄而获其利，所以益劝。”

《两都赋序》：“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馀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当时的一些著名赋家，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张子侨、扬雄、崔骃、李尤等人，都以辞赋优异进入仕途。而且据张衡《论贡举疏》中的记载，最迟到东汉之时已经确立了考赋取士的制度<sup>①</sup>。我们不知道这项制度贯彻到什么程度和持续了多久，但在它的影响之下，定然吸引住了大批热中于为官作宦的文人的注意力，则是不成问题的。

但汉代文人的“正途”出身仍应以经学为上。这不仅是因为经师声誉崇高，赋家地位卑微；而且经师门徒众多，彼此提携，踏进仕途更容易些，猎取高位更顺利些。

自元帝积极倡导儒学之后，文士进入仕途，一般必须接受经学的训练。翻阅《汉书》、《后汉书》中一些达官贵人的传记，诸如“经明行修”、“经术通明”之类的记载，数见不鲜。

《汉书·韦贤传》：“贤四子：长子方山，为高寝令，早终；次子弘，至东海太守；次子舜，留鲁守坟墓；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汉书·夏侯胜传》：“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

耕。’”

《后汉书·桓荣传》：“〔光武帝〕以荣为少傅，赐以輜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太常，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

这种学问已经成了谋取利禄的有效手段，那在占有这种知识的经学家看来，把它作为一笔财产传给子孙，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儒林中有所谓累世经学的世家出现。例如孔子一脉之在汉代者，多任博士之职，孔安国后以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有名，其孙孔霸至七世孙昱，凡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西汉大儒伏生亦世传经学，历两汉四百年；次如东汉桓氏，自桓荣以下，一家三代为五帝师，其馀门徒多至公卿，显乎当世。上述事实说明：随着累世经学的出现，还产生了累世公卿的现象，诸如西汉之时韦、平二氏曾再世宰相，于氏为两世三公，东汉之时汉西杨氏四世皆为三公，汝南袁氏累四世凡五公。这些达官贵人都是“门生故吏遍天下”，备受士人景羨；其他无此喧赫而亦以经学累世通显者，不一而足。

大家知道，汉代的经学分为今文与古文两大学派。西汉盛行今文学派，东汉盛行古文学派。二者之间虽然经常产生矛盾，实则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非原则纠纷，按其各别的经学内容来看，都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而在作着各种自成体系的解释。由是经学上产生了所谓师法、家法等说。师法为解说某种经典的一家之言，家法则从师法中分化出来的另一

支派。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愈分愈细碎，愈说愈支离，于是儒生年幼入学，皓首或不能说一经，本来用作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的经学，同时又起到了束缚士人头脑的作用。

随着汉代政权的稳定，统治阶级要求一切社会秩序都趋于稳定，“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为刘汉皇朝服务的正统思想也都应该稳定下来。为此统治者利用政治手段操纵学术活动，防止各学派内容的变质或相混，藉以统制思想。例如西汉之时众人荐孟喜为博士，宣帝闻其改师法，遂不用。东汉之时光武立五经博士，令各以家法教授；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刘珍等人诣东观各校讎家法；顺帝采纳左雄意见，命郡国所举孝廉皆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永元之时鲁丕上疏强调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徐防上疏言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因而主张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者皆正以为非，和帝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汉代儒生在学习问题上受着清规戒律的重重束缚。可以说，汉代的经学，犹如迷信《圣经》的神学。博士弟子学习某种经典，必须恪守家法，这里只有盲目信从的义务，没有发表怀疑的权利。因此，一代代经学的传授，后代经师继承前人成说，只能愈来愈趋烦琐，不大可能出现新创的成份。这样，汉代的学术界自然会弥漫着墨守成规的风气。

如上所述，汉代的经学对当时的士人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因此这种摹拟学风自然会波及其他文学领域。

汉魏六朝之时辞赋并称。由于刘汉皇室的提倡，西汉之时写作骚体的人很多。只是这批文人缺乏和屈原同样的品格和生活经历，因此他们的创作活动也就不免流为死板的摹



仿。王逸附入《楚辞章句》中的一些作品，就是明显的例证。《文心雕龙·时序》篇上说：“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餘影，于是乎在。”对此作了相当确切的概括和评判。

大赋这种文体是从楚辞之中演变出来的。早期赋家如司马相如等人的创作活动还有新创的成份，但到元、成之后的赋家也就深受摹拟学风的影响，很少出现新创的东西了。

汉赋固有想象丰富等特点，但赋家不从现实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不能突破原有的体制格局，这样，他们的写作很快地就形成了某种程式，一代代的作家也常是在摹拟中渡过其创作生涯了。

根据近代文学史家的研究，可以把汉赋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自汉初至武帝时为创始期，自武帝至元、成间为成熟期，自西汉末至东汉末为摹拟期，直到汉末魏初才重新转入创新期。比较起来，摹拟期历时最久，产生的作品最多，所谓汉赋四大家中的三家——扬雄、班固、张衡，都处在这一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创作活动很能代表汉代的文学风气。

总起来说，汉代摹拟学风的形成原因很多，而受经学上墨守家法的风气的影响至为深巨。当时除了民间文学领域中还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外，在文人的圈子内创新的空气也就显得很淡薄了。可以说，自西汉元、成时起，不论大小作家，或多或少都受着摹拟学风的影响。当时的一些著名作品很多是有所承袭而来的。

胡小石先生曾制《两汉模仿文学一览表》一种<sup>②</sup>。兹就其内容重加增订，列表于下，供学术界参考。

# 两汉摹拟作品一览表

		注	
周 秦	西 汉	东 汉	附
周 易	太玄杨雄	玄图张衡	《世说新语·文学》：“庾仲初作《扬都赋》成”条下刘孝标注引王隐论扬雄《太玄经》曰：“《玄经》虽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谓其屋下架屋。”
诗 颂	赵充国颂杨雄	安丰戴頌班固和薰邓頌、岑显宗頌傅毅	《文心雕龙·颂赞》：“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薰后，或拟《清庙》、《武庙》、《那》、《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
论 语	法言杨雄	郑志郑玄	《后汉书·郑玄传》：“〔玄歿〕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
尔 雅	方言杨雄		《华阳县志》卷十上《蜀郡士女赞》：“〔雄以〕典真正于《尔雅》焉，故作《方言》。”《左传》庄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采异方之语，谓之《方言》。”
苍颉篇	凡将篇 司马彪如 训纂篇 杨雄	十二章班固	《汉书·艺文志》：“汉兴，间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
虞 箴	十二州杨雄 二十五官箴 杨雄	百官箴 崔瑗、刘驹尊、胡广、徐、胡广	《后汉书·胡广传》：“初，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瑗郡崔瑗及子璆又临邑侯刘瑁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 扬雄与王充文学思想的对立

汉代自武帝起，思想定于一尊，统治者规定了烦琐的法定学说，驱使学者入其规范。流风所及，不但儒家中人重墨守，其他学派的人也沾染了摹拟的习气。《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古朴论蜀郡文士时说：“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见《论语》，作《法言》。”严君平是道家中人，本以清静无为为宗，而亦重摹拟，可见其时这种学风影响之大。

但汉代的摹拟大师毕竟首推扬雄。这从《两汉摹拟作品一览表》中也不难看出。他自己还曾自述摹拟活动之梗概。

《汉书·扬雄传》：“……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班固在《扬雄传赞》中也曾作过具体论述：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苍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扬雄是严君平的弟子，又是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为人

“默而好深湛之思”，喜作理论上的探索。他既是个经学家，又是个文学家，处在墨守家法极为严重的社会里面，而又身当复古风气极浓的王莽时代，各方面条件的孕育，促成他当上了文学理论上摹拟派的代表。

东汉初年的桓谭在《新论》中有如下的记载：

扬子云工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意林》卷三引，并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北堂书钞》卷一〇二）

扬雄的这种意见就很有代表性。在他看来，写作赋篇，用不到在生活中积累知识，只要反复阅读他人的作品，熟能生巧，也就可以写出类似的作品了。后代一些主张摹拟的理论，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等说，与此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扬雄的作品，可作上述学说的例证，里面充塞着学问，很少显露性灵。《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自〔司马长卿〕、〔王子〕渊以前，多役才而不课学；〔扬〕雄、〔刘〕向已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说明他的创作倾向还开启了一代风气，文士的作品中开始充塞儒家典籍中的辞句。刘勰在《事类》篇中进一步论述道：“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其后沿此道路而向前发展的人，更是习惯于以学识代替才情了。

《法言》里面还有一些类似经师口气的话，例如《学行》篇中说：“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一哄之市，不胜异意焉；一卷之书，不胜异说焉。一哄之市，

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进而要求遵从一家之说。

扬雄推崇孔子，推崇五经，可谓不遗余力。他“窃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平时“非圣哲之书不好”（《汉书·扬雄传》），带有极浓厚的儒家复古色彩。《法言·寡见》篇曰：“或问：‘处秦之世，抱周之书，益乎？’曰：‘举世寒，貂狐不亦煖乎！’”也就是说古代的五经可起覆被后世的作用。由此出发，他强调一切都应以圣人之道为准则。“舍舟航而济乎渚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乎异僎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同上）“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同上）自他建立这种较完整的原道、徵圣、宗经学说之后，由于它适应地主阶级政权建立上层建筑的要求，也就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法定正统思想。

五经的文章写得都较简单，先秦的语言和汉代的语言已有距离，因此当时的人学习经典都有困难，大家感到深奥而难于掌握，但在多识古文奇字而又不理会群众要求的扬雄看来，反而成了一种优点，因此他进而提倡文必艰深之说。

或问曰：“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欤？”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郭。”（《法言·问神》）

扬雄认为圣人之道深奥莫测，非常人所能窥及，而经典

内容形式上的艰深，正是可与天地并列的优异之处。他的哲学著作也是摹仿经典形式而成的。这样的作品，就在当时已经遭到他人的责难，尤其是玄之又玄的《太玄》，更难令人卒读，而他反在《解难》中辩解道：“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稀’，此非其操与！”从他这种孤芳自赏的可笑态度中也就可以看到摹拟派脱离现实的严重了。

这里还应指出，扬雄说的“形之美者”，并非指藻彩。在质与文的关系上，他是主张华实相副而又以质为先的。当然，他所强调的内容，大抵是些经典之陈言，因而并不显得新鲜和可贵。他所主张的文，也只是要求文字上的雕琢。《法言·寡见》篇中说：“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珣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这段文字也只有联系他的宗经思想和雕琢文风才能理解。

总起来说：扬雄主张复古，主张艰深，主张雕琢，以学问代替才情，以摹仿代替创造，构成了系统的摹拟理论，而这也正是后代一切摹拟派的共同特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他列为汉代摹拟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扬雄是我国摹拟文学的开山祖师，摹拟理论的奠基者。

扬雄的学说，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很受时人尊重；但随后出身于“细族孤门”的王充却提出了另一种与此相反的学说，对此作了实质上的批判。

有人认为：王充很推崇桓谭，桓谭最推崇扬雄，因此东



汉文论都出于扬雄。这种看法怕是对两汉思想斗争的复杂情况估计不足。我认为：从哲学上说，扬雄和王充都反对谶纬神仙之学，因而属于同一阵营；但从文学上说，扬雄主张摹拟，王充则强调创新，二者正相对立。可以说，《论衡》中涉及文学理论的一些文字，差不多都是针对摹拟派而发的。

王充曾对当代各种类型的文人作过详细的分析，他对统治阶级最为重视的经师和经生评价最低。《定贤》篇中说：

以经明带徒聚众为贤乎？则夫经明，儒者是也。……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遗误者，则为善矣。儒者传学，不妄一言，先师古语，到今具存，虽带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学，邮人门者之类也。

可以看到，王充不但重视学术思想上的创造性，而且注意这种思想一定要对现实有所裨益，而这正是当时的文人最为无能的地方。就是那些阅读面比较广泛的“通人”，虽然“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他们既缺乏劳动的本领，又缺乏解决实际事务的能力，只能停留在一些古人留下来的僵死的书本知识上面。王充极不满意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类也。”（《超奇》）“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点明了经学界由墨守家法所带来的严重弊病。

与此相关，上述各种摹拟派的论点也一一遭到了驳斥。